

两种辩证法的交锋

——从方法论视角看《哲学的贫困》对《贫困的哲学》的批判

姜汪维

摘要：面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丰富遗产，蒲鲁东将其理解为概念的堆积，马克思则看到了否定性的革命力量。蒲鲁东将辩证法的逻辑起点设定为二元分裂，马克思则将其视为矛盾的统一体。蒲鲁东将辩证法演绎为合而为一，马克思则将其演绎为对立统一。通过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得以初步建立：一是将唯物辩证法的对象性活动确定为物质生产实践；二是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确定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发展史；三是将未来社会实现的主体确定为无产阶级。在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以整体面貌出现。

关键词：《哲学的贫困》；《贫困的哲学》；唯物辩证法；实践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8.03.009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都尝试将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而对黑格尔辩证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原理，蒲鲁东和马克思因对其理解不同、运用不同，结论也截然不同。正如苏联学者卢森贝所指出的，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战“首先是反对其方法论的论战”^①。正是在对《贫困的哲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得以建立起来。

一、对辩证法的理解：概念堆积与否定性力量

蒲鲁东声称自己掌握了辩证法，但是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可归纳为六个字：正题、反题、合题^②。正题是“肯定”，指“好的方面”；反题是“否定”，指“坏的方面”；合题是“否定之否定”，指的是“保留好的方面，去除坏的方面”。这就是蒲鲁东所理解的辩证过程，由此他构建起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姜汪维，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石河子大学副教授（北京100081）。

基金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民族地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研究》(16JDSZK037)；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财经大学）资助项目(ZC2017110129)。

① [苏]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6页。

② 张一兵：《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接合——蒲鲁东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1期。

首先，蒲鲁东将一些抽象的经济范畴机械地置于正、反、合的框架之内。他认为，如果“劳动”是正题，那么“资本”就是反题，“平等”则是合题；如果“使用价值”是正题，则“交换价值”是反题，“构成价值”是合题；如果所有权的“共有”是正题，则“私有”是反题，“互助”是合题^①。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实际上是编造了一个自我设定——自相对立——自相合成的公式^②。显然，这种简单的逻辑只是从黑格尔辩证法那里学到了一些术语，并不是对资本运动过程的描述，而是一堆抽象概念的串联，既无前提亦无界定，全凭任意的编排，再辅之以一些经验现象的佐证，其结论必然偏离经济活动事实。比如蒲鲁东认为，只要处理好商品在流通过程的出售价格和成本价格的关系，就可以实现经济活动中的公平正义。具体办法是使“商品的出售价格等于它的成本价格”^③，使商品价值与市场价格相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互助合作的“人民银行”，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问题，重建社会平等。在蒲鲁东看来，“价值尺度理论或者价值比例理论其实就是平等的理论”^④。马克思的观点与之针锋相对，他认为，商品的出售价格不必完全等同于成本价格，也不必等同于商品价值，因为商品价值必然包含着成本价格和剩余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蒲鲁东所谓的“构成价值”，模糊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工资与劳动价值、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间的界限，从而掩盖了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简言之，价值增殖的秘密表面上完成于流通和交换，实际上根源于生产过程。通过对“构成价值”这一概念的批判，马克思科学地证明：价值虽然是一个“物”的概念，但本质上是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历史范畴，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发展的产物。而蒲鲁东却颠倒了，认为现实的生产关系只不过是一些原理和概念的化身，改变对概念的赋义就能改变现实的困窘。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彻底改变生产方式本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消除贫富分化，重塑社会之公平正义。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蒲鲁东的错误在于机械地认为“合题是通过对两项绝对对立的概念不断地肯定或不断地否定”^⑤，并把它看做是同义反复，从而否认了矛盾是具体的、历史的运动。

其次，蒲鲁东没有看到否定性的力量才是辩证运动活的灵魂。蒲鲁东辩证法的“正、反、合”逻辑只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统一以及社会历史中协调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辩证运动的实质是对现存事物的否定。也就是说，矛盾统一体中否定性的力量才是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否定性力量在蒲鲁东那里属于“坏的方面”，是辩证运动中应该被消灭的对象，他认为只有消灭“坏的方面”并保留“好的方面”，即把一个观念作为另一个观念的消毒剂，才能实现社会的进步。恰恰相反，黑格尔辩证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演进正是从否定而不是肯定的方面发展出来的，分裂和斗争才是辩证运动的内在源动力^⑥。按照蒲鲁东的理解，对立、分裂、斗争都是“坏的方面”，都应该被取消，但这种认识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和纯粹抽象罢了。与之相反，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把“坏的方面”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新生力量加以肯定。他举例道，在封建社会，如果新兴资产阶级只看到淳朴的田园风光、封建主们伟大的德行，而看不到封建特权、佃农、零散劳动等等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

^① 孙琳：《历史辩证法的建构与在场形而上学的终结》，载《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9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④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0页。

^⑤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3页。

^⑥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应的“坏的方面”，就不可能有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萌芽；同样，资产阶级从诞生时期，就包含着一个从封建时代残存的无产者（“坏的方面”），经过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从其胞胎发展出了现代无产阶级，正是这一新的历史主体推动社会走向更高形态——生产力的发展即源于阶级对抗^①。因此，马克思深刻指出，矛盾双方的共存、斗争最终融合出新事物才是辩证运动，如果消除了“坏的方面”，不允许否定性力量的发展，那就相当于切断了辩证运动^②。

二、对辩证法逻辑起点的把握：二元割裂与矛盾共同体

蒲鲁东将所有问题的逻辑起点割裂为二元对立，即“自我与非我、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③，具体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则是各种概念范畴的对立、主客体的对立，比如“劳动与资本、雇佣劳动与特权、竞争与垄断、共有制与私有制、平民与贵族、国家与公民、联合与个人主义”^④。实际上，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起点是一个矛盾共同体，“这种本有的东西是潜在的，因为它以思维中的统一为形式；它也可以说是现实的，因为它以存在着的统一为形式”^⑤。正如经济活动与人的关系：人生活在经济活动之中，是各种经济活动的主体；与此同时，经济活动也塑造了人，经济运动就是人的本质和力量在经济活动中的生成过程。马克思举例说，工人买马铃薯和妇女买花虽是自主意愿，但是决定这个意愿的却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消费并不比生产更自由^⑥。这个过程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是人的抽象，而是作为对立面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而在蒲鲁东这里，由于他将辩证运动的逻辑起点通过理性抽象设定为二元对立，故而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和实在性就被彻底抽象掉了。

马克思辩证法在逻辑起点上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首先，他承认矛盾共同体是辩证发展的“本有”，蕴含着现实性与潜在性的矛盾，历史就是在否定和不断否定自身的过程中展现生命进程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哲学的贫困》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作为否定因素天然地包含在封建社会之中，而资本主义在蕴含自身肯定因素的同时也生产否定自身的因素，在生产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压迫的力量^⑦，贫富差距、生产过剩、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的伴侣，其最终命运就取决于这个矛盾共同体内部两股力量的辩证运动。其次，马克思找到了“本有”最本质的内涵，那就是在具体的、感性的、历史中的人的实践活动。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自觉从生产关系入手，研究生产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行，以及这些生产关系之所以发生发展的历史。至此，在辩证法的逻辑起点上，马克思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放在一起同时进行批判，完成了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一切旧辩证法的扬弃和超越；它不再是黑格尔抽象的、思辨的辩证法的继续，而是历史的真正在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5页。

③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9页。

④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16页。

⑤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4页。

三、对辩证法的演绎：合而为一与对立统一

在黑格尔那里虽然历史成了“精神现象学”，是围绕“绝对精神”而展开的观念的、思辨的、抽象的历史，但是却揭示出了对立统一这一辩证运动的根本特征。而蒲鲁东的辩证法演绎过程实际上是分裂——消灭对立面——同一，因为他把各个环节、所有观念都看成一般抽象，不承认辩证法是现实和历史生命力的体现，只把它当成了到达真理境地的“脚手架”。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对辩证法的演绎从来没有超越正题和反题这个简单的头两级^①，没有达到新生的“合”，实际上无法到达真理的境地。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基于唯物史观的改造，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改造为“肯定、否定、不断否定”^②，确立了否定的绝对性和肯定的相对性，由此形成一个完整而开放的逻辑体系。首先，历史是多元统一的共同体，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历史本身所蕴含的否定力量。如果否认历史的这种自我否定、自我对象化，那么必然会到历史之外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其结果是将历史与人及其感性的实践割裂。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将历史的“剧中人”与“剧作者”统一于一身，人与世界本就是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人对世界的改造就是对现实的不断否定；而蒲鲁东只能简单认识到前一层次，无法达到后一层次。其次，历史是否定性力量对肯定性方面的不断扬弃。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至今的发展史就是处于剥削压迫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以及工人阶级不断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史。从辩证法视角看，这种“阶级对抗”是历史的辩证法的自我排斥、异化、对象化过程，也是自我扬弃的实现环节，后来《共产党宣言》中“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在此处已呼之欲出了。最后，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基于开放向度的自我回归，即通过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实现社会关系、自然关系统一于人自身。因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不但突破了黑格尔辩证法“绝对理性”的独断与蒲鲁东辩证法的神秘主义，而且突破了形而上学封闭而昏暗的体系，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从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自身进行否定的力量的历史进步性。

四、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在批判中逐渐生成

恩格斯对《哲学的贫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哲学的贫困》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通过该著“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③。有学者认为，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④。《哲学的贫困》之所以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以整体面貌出现，其重要原因在于方法论上突破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形成了辩证法的唯物论逻辑。这个辩证法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政治经济学研究置于具体的、鲜活的、统一的历史情境中，把研究对象确定为“不断出场”的人类的生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02 页。

^② 孙琳：《历史辩证法的建构与在场形而上学的终结》，载《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05 页。

^④ 赵家祥：《〈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 年第 5 期。

实践活动。政治经济学至此已不再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换言之，辩证法到马克思这里，并不存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现实批判与未来建构的二元对立和非此即彼的关系问题，而是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人类社会和社会的人类”^①，第一次真正完成了正、反、合的逻辑和历史的自洽，形成了历史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一）唯物辩证法的对象性活动：物质生产实践

所谓物质生产实践，首先是实践。实践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的、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也是各种理论、观念得以形成的基本来源和发展变化的最终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又必然结成一定的关系并互为对象、相互影响，由此自然成为“社会的自然”（或“历史的自然”），社会成为“自然的社会”，历史成为“自然的历史”。简言之，实践使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为我而存在”^②的否定性的矛盾关系，这就从根本上科学地解答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使唯物主义与人的主体性统一起来，唯物论与辩证法也因此结合起来^③。其次是物质生产实践。它是所有人类实践活动中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实践体现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鲜明地表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财富与劳动的根本对立。马克思在社会有机体的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肯定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从而也就找到了辩证法理论的最现实的批判力量。再次，思想认识不过是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反映。因此，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实际上是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展开，而历史辩证法则是社会物质生产实践规律在逻辑上的抽象。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通过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批判了蒲鲁东将经济范畴永恒化的谬误；通过强调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将其还原为具体的、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性活动，批判了蒲鲁东以交换价值的平等特性（“交换”也有自身发展史），从而企图用交换价值与成本价值的对等来消除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天真幻想^④；通过肯定“否定性力量”来把握社会历史发展大势，从而超越了黑格尔和蒲鲁东把一切人和事物都抽象为逻辑范畴、只能在思维世界中回归人本身的悲观，对创造新世界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他生动地证明了人类存在的实践性就是社会历史全部矛盾性的根源。总而言之，通过将人类历史的考察置于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之上，将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整体性的内在统一。

（二）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发展史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分工和机器”为例，较为明晰地论证了生产如何在特定的关系之下运行的过程；证明了生产力是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关系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发展水平，两者的辩证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首先，“分工”不是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从来就有的、单纯的、抽象的范畴，而是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条件下的产物，它属于生产关系。其次，“机器”是“一种生产力”^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

③ 孙正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④ 杨洪源：《同时代思想图景中的〈哲学的贫困〉》，载《哲学动态》2016年第11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2页。

“分工”是“机器”的结果，而不是其前提。“分工”规模的扩大、细致程度的加深，使“机器”加快了工具的集合，建立了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且使生产向外扩张，走向了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换言之，生产关系通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优化了生产关系。最后，“分工”和“机器”相互作用，互为促进。“分工”的目的是扩大再生产，提高生产力，改进了“机器”；而“机器”的发明又促进了分工的扩大，且使旧的分工消失，新的分工产生。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不仅包含劳动工具，而且包含了劳动者本身，与生产关系密切相联，因此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行了总结性概括：“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①

（三）唯物辩证法的现实追问：历史的主体及未来社会发展前景

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将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分解为自由意志、公正平等和上帝，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终将在“好的方面”战胜“坏的方面”中得到永恒，“一切都在为这场庄严的复兴作准备，一切都在宣告虚构的王国已经过时，社会行将回复到如实反映其本性的状态”^②。实际上，这种乌托邦理想只能存在于抽象的意念之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蒲鲁东只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了黑格尔曾经为宗教、法学等做过的事情^③。蒲鲁东力图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找到历史的本质和通往未来之路，但不幸的是，由于他辩证法的不彻底，最终还是没有走出黑格尔哲学的窠臼。他所谓“合题”只能寄希望于上帝之手，历史在他那里没有找到科学的出路。正如马克思所言，这反映出蒲鲁东始终没有超出小资产阶级的局限，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重回中世纪、重回手工作坊之中做手工业师傅与学徒之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④。因此，对于蒲鲁东而言，历史只有客体，没有主体，历史的“剧作者”另有其人。而马克思则认为，只要我们把处在自然和社会这双重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视为他们自身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那就找到了历史的主体；只有找到历史的真正主体，才能找到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在马克思这里，历史既是现实的，又是潜在的。马克思通过历史分析，发现机器大工业把大批无产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和利益诉求，现代生产力呼唤新的生产关系，未来社会的发展图景即潜藏于现实之中。经济斗争、罢工、工会组织等现实的工人阶级运动，慢慢使无产阶级群众成为“自为的阶级”^⑤，具有社会主义觉悟，从而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和蒲鲁东两种辩证法的交锋，表面上看是方法论的不同，实际上反映的是两人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不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又取决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而时代精神和主要矛盾这两者又都植根于社会实践。很显然，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深刻地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把握了时代精神，找到了解决时代问题的“总钥匙”和历史前进的方向。蒲鲁东以抽象的哲学逻辑体系来投射现实，因此注定解释不了“贫困的哲学”，而只能反证自己是“哲学的贫困”。

（责任编辑：聂大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02 页。

^② [法]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93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0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30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74 页。